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

——生活质量和社区依恋的作用

郭安禧^{1,2} 郭英之^{1,3} 李海军³ 姜红²

(1. 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

2. 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上海 201400;

3. 复旦大学旅游学系,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深刻揭示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形成机制对当地旅游业的长期成功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从浙江省乌镇收集的458份有效问卷,实证考察了旅游地居民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探讨了生活质量的中介作用和社区依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生活质量是较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更近端的支持旅游开发的前因变量;生活质量部分中介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以直接影响为衡量依据会低估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社区依恋正向调节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负向关系。研究结论为科学评估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揭示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形成机制、增进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更大支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旅游影响感知 支持旅游开发 生活质量 社区依恋

中图分类号:F59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8)02—0162—14

一、引言

旅游开发给旅游地居民带来各种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有损他们日常生活的消极影响,如物价上涨、交通拥挤等。由于这些消极影响,作为参与主体的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对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原因有二:一是居民的生产、生活场景是当地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为关键的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没有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这些旅游吸引物的魅力会降低(Nunkoo和Ramkissoon,2012)^[1]。二是居民支持旅游开发关系到主客互动下旅游者的体验质量。居民不支持旅游开发容易引发居民与旅游者的矛盾冲突,导致旅游者的满意度和重游意愿下降(Kim等,2015)^[2]。因此,如何增进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是旅游学界和业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形成机制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青睐。综观现有相关成果,以下三方面尚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可能不是支持旅游开发最近端的前因变

收稿日期:2017-12-12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旅游目的地旅游客源忠诚度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71373054);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古镇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形成机理及其空间差异”(2016M601516);上海商学院上商学者项目“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形成机理研究”(16-11051)。

作者简介:郭安禧(1977-),男,江西吉安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旅游市场营销,电子邮箱:guoanxi319@163.com;郭英之(1964-),女,河北张家口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是旅游市场,电子邮箱:yingzhig@qq.com;李海军(1982-),男,甘肃天水人,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生态旅游与旅游资源开发,电子邮箱:lihaijun19820101@qq.com;姜红(1966-),女,山东牟平人,教授,研究领域是酒店管理与市场营销,电子邮箱:jianghong007@126.com。

量。以往研究(如 Nunkoo 和 Gursoy,2012^[3];王咏、陆林,2014^[4])通常将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作为影响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最直接前因。然而,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是他们对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进行综合评价后的结果(Gursoy 和 Rutherford,2004)^[5]。这意味着,支持旅游开发的直接前因中,除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外,还应该存在一个受二者共同影响的、能够体现“综合评价”的变量,而且该变量可能是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重要前因。但是,从现有研究看,甚少学者对此类变量进行实证探讨。Woo 等(2015)^[6]认为,生活质量能对居民支持旅游开发进行有效的预测。卢松等(2008)^[7]指出,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皖南古村落开始出现明显反对者的原因在于,旅游业在生活条件等方面对居民的生活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据此推测,生活质量可能就是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共同影响的、并对支持旅游开发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

其次,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可能被低估了。正如前文所述,如果生活质量是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共同影响的、并对支持旅游开发有促进作用的变量,那么,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不仅有直接影响,还有通过生活质量传导产生的间接影响。相应地,如果要判断它们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大小,就应该在总体影响(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之和)的层面进行比较。然而,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如 Nunkoo 等,2012^[8];王咏、陆林,2014^[4])往往以直接影响进行衡量,没有考虑可能存在的间接影响,从而导致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可能被低估。研究表明,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是紧密相关的(郭英之等,2007^[9];何学欢等,2017^[10])。旅游影响感知可以显著预测生活质量(Kim 等,2013)^[11],而生活质量又会对支持旅游开发产生积极影响(Liang 和 Hui,2016)^[12]。但从现有研究看,鲜有研究探讨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是否会经过生活质量的中介传导对支持旅游开发产生间接影响。

再次,个人价值系统因素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可能有调节作用。以往研究通常以社会交换理论作为解释居民支持旅游开发形成机制的理论框架,但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做法存在局限性(Nunkoo 和 Gursoy,2012)^[13]。因为,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不仅取决于资源交换的质量,还受到个人价值系统因素的影响,如果单纯用社会交换理论进行解释,就会降低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模型的预测力(Ryan 等,1998)^[14]。为此,Pappas(2014)^[15]建议,未来研究应将社会交换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的重要变量进行适当整合。场所认同理论中,属于个人价值系统范畴的社区依恋,描述了居民参与和融入社区的程度和方式,反映了居民对社区的根植感和归属感(Wang 和 Xu,2015)^[16],是影响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最稳定、最重要的因素(史春云等,2010)^[17]。因此,有必要考虑该因素对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然而,以往研究一般将其作为前置因素,罕见学者探讨它的调节作用。Um 和 Crompton(1987)^[18]发现,居民对社区的依恋程度不同,其旅游开发态度也存在差异。依恋程度高的居民倾向负面评价旅游开发带来的影响,因而对旅游开发的支持意愿比较低;而依恋程度低的居民则乐见旅游开发带来的变化,因而会对旅游开发持更强的支持态度(Deccio 和 Baloglu,2002)^[19]。由此推测,社区依恋可能对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内容,本文构建以生活质量为中介变量和以社区依恋为调节变量的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包括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以浙江省乌镇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收集的有效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模型检验,以期在理论上深刻揭示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形成机制,在实践中为促进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提供现实指导。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1. 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是指居民对自身居住空间旅游业发展中的人地关系和物质环境改变的主观

认知(王纯阳、屈海林,2014)^[20]。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是指居民支持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Wang和Chen,2015)^[21]。虽然有的研究(如卢松等,2008^[22];Sinclairmaragh和Gursoy,2016^[23])将支持旅游开发视为一种态度,但这与视其为行为意向并不矛盾,因为行为意向是态度的三个成分之一,表述为行为意向只是对态度内容的具体化。本文认同支持旅游开发为行为意向的一种形式。

旅游影响总体上分为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相应地,居民对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的主观认知称为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理论认为,态度的三个成分——认知、情感、意向,三者之间存在层级结构关系,认知是意向产生的基础,意向是认知和情感的最终结果(Bagozzi,1982)^[24]。据此,属于认知范畴的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可能对属于意向范畴的支持旅游开发存在重要影响。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任何交换都是一种利益互惠行为,有益的结果能使交换方产生积极的态度(Chen和Chen,2010)^[25]。在旅游交换中,如果居民感知到旅游开发能为他们带来积极影响,将会持支持的态度;相反,如果居民感知到旅游开发会给他们带来大的消极影响,则可能持反对的态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1a}: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_{1b}: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2. 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品质的关系

生活品质有客观生活品质和主观生活品质两个概念(梁增贤等,2015)^[26]。客观生活品质是指由一些经济指标(如经济收入)反映的个体的生活水平。该概念只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客观方面的重要性,未能反映物质条件改善下的个体的生活品质,也没有体现个体主观感知的复杂性和差异性。鉴于这些不足,当前客观生活品质更多地演变为“社会指标”,逐渐淡出了生活品质研究领域(Liang和Hui,2016^[12];Uysal等,2016^[27])。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和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主张从主观视角探讨生活品质。主观生活品质是指与自己的需要和期望相比,个体对生活各方面的总体满意度(Kim等,2013)^[11],通常以生活满意度或主观幸福感为测量指标(周长城、刘红霞,2011)^[28]。本研究探讨的“生活品质”系主观生活品质,也有文献(如Andereck和Nyaupane,2011^[29];梁增贤等,2015^[26])称之为“生活品质感知”(Quality of life perception)。为了与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保持术语使用的一致性,本文沿用“生活品质”(Quality of life)的表述。

自底向上溢出理论(Bottom-up spillover theory)认为,满意度包括生活关心满意度、生活维度满意度和总体生活满意度(即生活品质)三个层次,它们自底向上分别处于金字塔形的底层、中层和顶层(Kim等,2013)^[11]。生活关心满意度是构建整个金字塔形的底层和基础,该领域的满意度不断累积,会沿着垂直方向产生溢出效应并影响位于顶层的生活品质。因此,生活关心满意度不仅与生活品质相关,而且还可能具有重要影响。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属于居民生活关心的范畴(Kim等,2013)^[11],依据自底向上溢出理论,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就有可能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Jeon和Kang(2016)^[30]考察了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部分维度与居民生活品质的关系,发现经济获益感知(属于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品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成本感知(属于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品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本文探讨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生活品质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2a}: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品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_{2b}: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品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3. 生活品质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依照主观生活品质的定义,生活品质实际上是满意度的一种形式。从态度的三个成分角度看,作为满意度的生活品质当属态度成分中的情感范畴(吴泗宗、朱家川,2015)^[31]。“认

知—情感—意向”关系理论认为,基于认知产生的情感是意向形成的重要基础。依据该理论,属于情感范畴的生活质量与属于意向范畴的支持旅游开发相关,且是支持旅游开发态度形成的重要源泉。一些研究(如 Croes,2012)^[32]认为,生活质量对支持旅游开发存在潜在影响,但缺乏实证研究予以支持(Woo等,2015)^[6]。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如果交换方感知到从交换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将会表现出支持的态度;相反,则可能持反对的态度。在旅游交换中,居民的日常生活既因积极旅游影响获得改善,同时也因消极旅游影响受到冲击。这种背景下,居民的生活质量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权衡积极旅游影响(感知获益)与消极旅游影响(感知成本)大小“试金石”的角色。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居民若感知到生活质量获得提高,出于心理上的交换,对旅游开发将持支持态度(Liang和Hui,2016)^[1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₃:生活质量对支持旅游开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4. 生活质量的中介作用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任何社会活动都可以归结为是一种交换关系,有益的结果能使交换方产生积极的态度,反之则产生消极的态度。在旅游交换中,从积极面而言,旅游开发为居民带来经济收入增加等积极影响,增强他们的物质幸福感等,提高其生活质量,出于心理交换,居民会积极支持旅游开发;从消极面而言,旅游开发给居民带来环境污染等消极影响,削弱他们的健康与安全感等,降低其生活质量,同样出于心理交换,居民可能不太情愿支持旅游开发(Kim等,2013^[11];Woo等,2015^[6])。由此,生活质量在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可能存在传导效应。另据“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理论,态度的认知成分对意向成分不仅有直接影响,还会通过情感成分的中介传导产生间接影响。基于此,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属于认知成分)可能通过生活质量(属于情感成分)部分中介影响居民支持旅游开发(属于意向成分)。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4a}:生活质量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H_{4b}:生活质量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5. 社区依恋的调节作用

社区依恋是地方依恋的一种类型,指居民与其居住社区的情感联结,包括根植感、归属感和满意度等(汲忠娟等,2017)^[33]。旅游开发改变了旅游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环境,因而影响到居民对居住社区的依恋感。史春云等(2010)^[17]通过比较九寨沟、庐山、周庄三个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开发态度,发现社区依恋是影响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最稳定、最重要的因素。由此,不能忽视社区依恋在居民支持旅游开发形成机制中的作用。

双重态度模型理论认为,人们对同一态度客体能同时存在能被意识到的外显态度和无意识的内隐态度两种不同的态度(Wilson等,2000)^[34]。依据该理论,社区依恋相应地可以分为外显依恋和内隐依恋。外显依恋是能被个体自我报告出来的依恋状态,它以外显的方式反映个体的意识、情感和自我认同;内隐依恋是个体与依恋主体交互过程中形成的情感联结,它以内隐的方式内化于个体情感之中,并能持续、稳定地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骆泽顺、林璧属,2014)^[35]。当内隐依恋与外显依恋不一致,内隐依恋对个体行为起主要作用;而当二者表现一致时,能促使彼此间的良性互动。

在特定诱因(如旅游开发)的激发下,内隐依恋会无条件地、自动地激化而转变为外显状态。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的自然、人文和经济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旅游开发虽然给当地居民带来各种各样的积极影响,但对于高社区依恋的居民而言,代表其过去的物理氛围发生了或大或小的改变(Scannell和Gifford,2010)^[36],因而由内隐依恋转成的外显依恋就会减弱,同时给内隐依

恋负向反馈,表现在旅游开发态度上倾向于负面。对于低社区依恋的居民,由于与居住社区在互动中形成的内隐依恋尚未内化于个体情感,因而外显依恋表现较弱且易受外界因素影响。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可以满足居民的个体需要,会从外部增强其对居住社区的满意度,表现在旅游开发态度上倾向于正面。

对于消极旅游影响,高社区依恋居民能够敏锐地感知到地方特征、人地关系等方面发生的改变,从而触动其与居住社区因长期生活体验而形成的根植感、归属感和满意度等,这就会减弱社区居民的外显依恋程度,依据社区依恋的内部工作原理,外显依恋同时又给内隐依恋负向的反馈,并会在支持旅游开发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消极态度(骆泽顺、林璧属,2014)^[35];低社区依恋的居民与居住社区虽然也存在交互过程,但交往经历尚未内化为内隐状态的存在形式,因而对消极旅游影响的敏感度较低,倾向于关注旅游开发的积极影响,结果对旅游开发表现出较弱的消极态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5a} :社区依恋负向调节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对于高社区依恋的居民,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弱;对于低社区依恋的居民,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

H_{5b} :社区依恋正向调节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对于高社区依恋的居民,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强;对于低社区依恋的居民,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弱。

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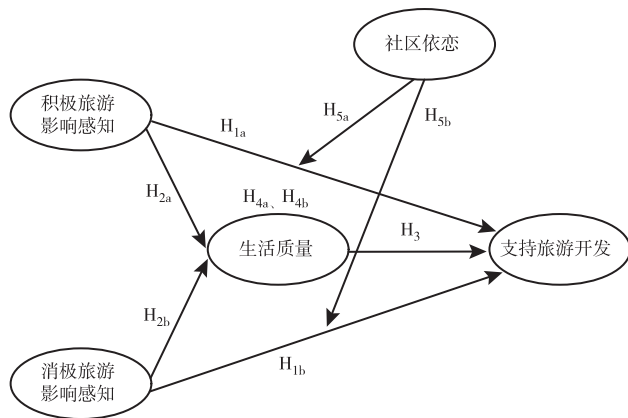


图1 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影响的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三、研究方法

1. 案例地选择

乌镇隶属浙江省桐乡市,有1300年的建镇史,是中国江南六大古镇之一,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十大魅力名镇。距离上海、杭州、苏州等长三角经济发达城市均在两小时车程内,良好的地理区位为乌镇带来了较大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凭借底蕴深厚的人文历史、清新典雅的水乡风貌、灿烂多姿的民俗风情,1991年乌镇被评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2001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预备清单。1999年当地政府成立乌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东栅和西栅景区的资源开发和经营管理。2007年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乌镇旅游增资控股(持股60%),获得东栅和西栅景区的独家经营权。近年来,经乌镇政府大力营销、强势企业经营管理,乌镇旅游业取得巨

大成功,2016年乌镇接待游客人次758.96万,公司全年营业收入突破13亿元,其开发模式被旅游业界称为“乌镇模式”。乌镇旅游开发对当地居民生活质量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旅游设施和基础设施得到完善,西栅居民整体外迁和东栅居民禁止经商,商业繁华但物价比周边地区高等,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正影响着居民的旅游开发态度。由此,选择乌镇为案例地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2. 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乌镇当地居民为调查对象。调查时间从2017年3月25日开始,至5月7日结束。调查地点包括环河路、慈云路、南栅老街等13条街道,东栅1个景区,银杏小区、浮澜桥小区、三里塘小区以及东栅和西栅景区周边的居民区、茅盾广场等。先后进行了四次问卷调查,每次调查的成员包括1名专业教师和3~5名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沿街采取入户(店)调查的方式发放问卷,居民小区和茅盾广场采取拦截式便利抽样的方式发放问卷。问卷由被试现场填答,填完之后由调研人员现场回收。问卷发放之前,调研人员询问被试是否为乌镇本地人(即居住在乌镇的非常外来人口),如果回答“是”则发放问卷,否则放弃调查并寻找下一位调查对象。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提高被试填答的积极性,也告知认真填答问卷将获赠一份精美指甲剪礼品。共发放问卷480份,剔除数据缺失较多和重复选择较多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458份,有效率为95.4%。

有效样本的特征表现为:在性别方面,男性占45.4%,女性占54.6%,男女比例相差不大;在年龄方面,18~24岁占14.0%,25~34岁占34.1%,35~44岁占26.8%,45~54岁占15.0%,54岁以上占10.0%,以中青年为主;在文化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占34.6%,高中或中专占38.8%,大专或本科占26.1%,研究生占0.5%,以中等及以下学历为主;在月收入方面,2000元及以下占8.3%,2001~3000元占18.3%,3001~4000元占34.1%,4001~5000元占17.8%,5000元以上占21.6%,以中等收入为主;在职业方面,工人占2.3%,学生占3.8%,公务员占1.5%,农民占0.3%,个体经营商占54.9%,教师占0.8%,专业技术人员占5.5%,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占2.3%,服务或销售人员占19.5%,离退休人员占3.3%,其他占6.0%,以个体经营商和服务或销售人员为主。

3. 变量测量

为了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采用国外应用成熟的量表。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5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完全同意。

(1)积极旅游影响感知。该变量的测量采用Lee(2013)^[37]研究中的量表。该量表包括“旅游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旅游增进了当地居民与游客的文化交流”“旅游促进了当地文化活动的的发展”“旅游增进了居民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旅游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旅游增加了当地的财政收入”六个题项。本文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值为0.810,大于推荐值0.7。

(2)消极旅游影响感知。该变量的测量采用Nunkoo和Ramkissoon(2011)^[38]研究中的量表。该量表包括“旅游加剧了当地的环境污染”“旅游增加了游客与居民的冲突”“旅游增加了当地的犯罪率”“旅游改变了当地原有的文化”四个题项。本文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值为0.616。Cronbach's α 值未达到0.7,原因可能是被试对量表反映的消极影响感知略低所致。Nunnally(1978)^[39]认为,可以接受的信度系数的临界值为0.6。因此,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值可以接受,能够满足研究需要。

(3)支持旅游开发。该变量的测量采用Wang和Xu(2015)^[16]研究中的量表。该量表包括“我支持某某地吸引更多的游客”“我支持某某地增加旅游吸引物”“我支持某某地在旅游开发方面增加投资”“某某地应该考虑各种类型的旅游开发”4个题项。本文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值为0.873,大于推荐值0.7。

(4)生活质量。该变量的测量采用Woo等(2015)^[6]研究中的量表。该量表包括“我在某某地的生活条件很好”“我有较强的购买力”“我得到了生活中我认为重要的东西”“总体而言,我对在

某某地的生活感到满意”四个题项。本文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784,大于推荐值 0.7。

(5)社区依恋。该变量的测量采用 Ramkissoon 和 Smith (2013)^[40] 研究中的量表。该量表包括“除非外出办事,平时我更喜欢待在某某地”“我对某某地的喜欢程度胜过其它任何地方”“出门在外时,我经常想起我居住的某某地”“我觉得我离不开某某地和某某地的人”“我认为某某地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适合居住”“在某某地生活比在其他地方生活更能让我感到满意”“某某地给我提供了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生活条件”七个题项。本文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910,大于推荐值 0.7。

(6)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认为,旅游地居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职业等人口学特征变量与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有密切关系(徐文燕、钟丽莉,2016^[41]; Gaunette,2017^[42])。因此,本文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等五个变量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支持旅游开发、生活质量、社区依恋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相关系数为正值且显著($r = 0.449, p < 0.01$),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相关系数为负值亦显著($r = -0.219, p < 0.01$),假设 H_{1a} 和假设 H_{1b} 得到验证;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401, p < 0.01$),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r = -0.013, p > 0.05$),假设 H_{2a} 得到验证,假设 H_{2b} 未获验证;生活质量与支持旅游开发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502, p < 0.01$),假设 H_3 也得到验证。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1. 积极旅游影响感知	4.107	0.617	—				
2. 消极旅游影响感知	2.638	0.760	-0.092*	—			
3. 生活质量	3.489	0.707	0.401**	-0.013	—		
4. 社区依恋	3.587	0.842	0.338**	-0.038	0.480**	—	
5. 支持旅游开发	4.136	0.751	0.449**	-0.219**	0.502**	0.434**	—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问卷调研中,由于每份问卷的全部数据均由同一被试填答,因此,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本文参考 Podsakoff 等(2003)^[43] 的建议以及李召敏、赵曙明(2015)^[44] 的做法,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将测量积极旅游影响感知等五个潜变量的所有题项纳入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依据提取的因子数和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力检视共同方法偏差的严重程度。结果显示,共提取五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1.235%,低于 50% 的判断标准,这说明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变量区别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变量之间的区别效度,利用 AMOS17.0 对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支持旅游开发、生活质量、社区依恋五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由表 2 可知,从各项拟合指标看,五因子模型($\chi^2/df = 2.669$, 小于 3; $GFI = 0.879$, 接近 0.9; IFI 、 TLI 、 CFI 分别为 0.917、0.906、0.917,均大于 0.9; $RMSEA = 0.060$, 小于 0.08)优于其他比较模型,且与样本数据拟合良好,这表明积极旅游影响感知等五个变量之间具有理想的区别效度,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数据分析。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GFI	IFI	TLI	CFI	RMSEA
五因子模型 (P、N、Q、S、A)	707.392	265	2.669	0.879	0.917	0.906	0.917	0.060
四因子模型 a(P、N、S、Q + A)	796.835	266	2.996	0.866	0.901	0.887	0.900	0.066
四因子模型 b(P、N、Q + S、A)	870.417	266	3.272	0.865	0.887	0.872	0.886	0.071
三因子模型 (P、N、Q + S + A)	922.269	268	3.441	0.862	0.878	0.862	0.877	0.073
二因子模型 (P + Q + S + A、N)	1002.975	271	3.701	0.859	0.863	0.847	0.862	0.077
单因子模型 (P + Q + S + A + N)	1212.958	275	4.411	0.834	0.824	0.807	0.823	0.086

注: P 表示积极旅游影响感知, N 表示消极旅游影响感知, Q 表示生活质量, S 表示支持旅游开发, A 表示社区依恋
资料来源: 本文整理

4. 假设检验

(1) 生活质量的中介作用。如前文所述, 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虽然具有负相关关系, 但是未达到显著水平。因此可以认为, 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不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意味着, 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只具有显著直接影响, 不会通过生活质量的传导机制对支持旅游开发产生间接影响。由此, 假设 H_{4b} 未获得验证。

但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可能会通过生活质量的中介传导影响支持旅游开发, 本文采用 Baron 和 Kenny(1986)^[45] 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对此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首先, 检验自变量(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中介变量(生活质量)的影响。从模型 2 可知, 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 = 0.385, p < 0.001$), 假设 H_{2a} 再次获得验证。其次, 检验自变量(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因变量(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从模型 4 可知, 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 = 0.438, p < 0.001$), 假设 H_{1a} 也再次得到证实。再次, 检验中介变量(生活质量)对因变量(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从模型 5 可知, 生活质量对支持旅游开发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beta = 0.484, p < 0.001$), 假设 H_3 亦再次得到验证。最后, 检验自变量(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中介变量(生活质量)对因变量(支持旅游开发)的共同影响。从模型 6 可知, 加入“生活质量”后, 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 = 0.297, p < 0.001$), 但是, 影响效应有所减弱(从 0.438 减少到 0.297), 由此可以判断, 生活质量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假设 H_{4a} 获得支持。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项目	变量	生活质量		支持旅游开发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控制变量	性别	0.004	0.007	0.045	0.048	0.042	0.045
	年龄	-0.130*	-0.110*	-0.110*	-0.087	-0.047	-0.047
	文化程度	0.029	0.016	-0.008	-0.023	-0.022	-0.029
	职业	-0.001	0.017	0.002	0.023	0.003	0.016
	月收入	0.152**	0.137**	0.158**	0.141**	0.085	0.091*
自变量	积极旅游影响感知		0.385***		0.438***		0.297***
中介变量	生活质量					0.484***	0.365***
模型摘要	F 值	4.766***	18.407***	3.516**	22.073***	26.467***	32.274***
	R^2	0.050	0.197	0.037	0.217	0.260	0.334
	ΔF 值	4.766***	82.326***	3.516**	110.595***	135.969***	100.306***
	ΔR^2	0.050	0.147	0.037	0.190	0.223	0.297

注: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资料来源: 本文整理

(2)社区依恋的调节作用。检验包括以下三个步骤:首先,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五个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其次,将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社区依恋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最后,将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依恋的乘积项纳入回归方程,考察乘积项的系数。为了减小回归方程中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构造乘积项之前对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依恋进行了中心化处理。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项目	变量	支持旅游开发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控制变量	性别	0.045	0.037	0.029	0.037	0.035
	年龄	-0.110*	-0.175***	-0.195***	-0.175***	-0.198***
	文化程度	-0.008	-0.011	-0.017	-0.011	-0.017
	职业	0.002	0.050	0.053	0.050	0.053
	月收入	0.158**	0.131**	0.137**	0.131**	0.138**
自变量	积极旅游影响感知		0.308***		0.307***	
	消极旅游影响感知			-0.165***		-0.176***
调节变量	社区依恋		0.368***	0.470***	0.368***	0.459***
乘积项	积极旅游影响感知 × 社区依恋				-0.004	
	消极旅游影响感知 × 社区依恋					0.081*
模型摘要	F值	3.516**	32.842***	25.344***	28.675***	22.815***
	R ²	0.037	0.338	0.283	0.338	0.289
	△F值	3.516**	102.220***	76.958***	0.012	3.950*
	△R ²	0.037	0.301	0.245	0.000	0.006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由模型10可知,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依恋的乘积项对支持旅游开发不具有显著影响($\beta = -0.004, p > 0.05$),这表明,社区依恋对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因此,假设H_{5a}未获支持;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依恋的乘积项对支持旅游开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 = 0.081, p < 0.05$),这表明,社区依恋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关系间起着调节作用,因此,假设H_{5b}获得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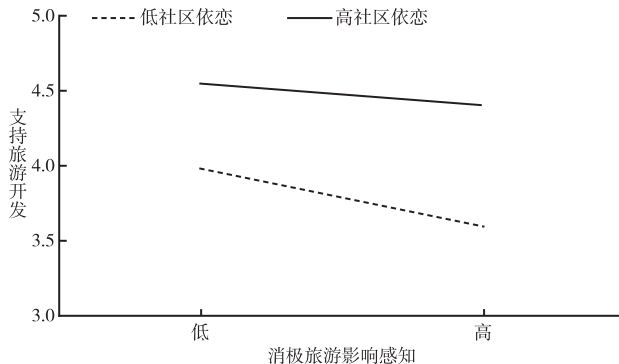


图2 社区依恋对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关系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为了更直观地表明社区依恋的调节效应,本研究绘制了社区依恋对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关系的调节效应图(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社区依恋能够调节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与低社区依恋的居民相比,支持旅游开发在高社区依恋的居民中对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回归斜率值更大。这表明,居民的社区依恋程度越大,越能维持较稳定、较强的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负向影响。由此,假设 H_{5b} 得到进一步支持。

五、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本文以生活质量为中介变量和以社区依恋为调节变量,以浙江省乌镇为案例地,实证考察了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包括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得到以下四方面的结论:第一,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和生活质量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不会影响生活质量,对支持旅游开发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生活质量对支持旅游开发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第四,社区依恋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居民社区依恋程度越大,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负向影响越强。

2.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证实了相较于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生活质量是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更近端的前因变量。本文的结果表明,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影响,其平行变量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会正向影响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又会正向影响支持旅游开发。因此,与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相比,生活质量是影响支持旅游开发更近端的变量。以往研究(如 Nunkoo 和 Gursoy, 2012)^[3] 通常以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作为支持旅游开发最直接前因,没有考虑二者共同影响的其他结果变量及其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未能很好地揭示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形成机制。尽管有少量研究(如卢松等, 2008)^[7] 暗示生活质量是影响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重要因素,也有学者(如周长城, 2004)^[46] 强调提高生活质量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在居民旅游开发态度研究中,甚少将生活质量作为支持旅游开发的前因变量。本文发现,生活质量对支持旅游开发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是支持旅游开发的重要前因变量。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将生活质量引入模型,拓展了居民支持旅游开发前因研究范围。

第二,证实了生活质量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起中介作用。本文的结果表明,生活质量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不仅有直接影响,还会通过生活质量的中介传导产生间接影响。以往研究(如刘昌雪, 2008^[47]; Nunkoo 和 Ramkissoon, 2012^[8]) 由于以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作为支持旅游开发的直接前因,往往通过比较二者的直接影响来判断居民的旅游开发态度。然而,本文的结果表明,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应从总体影响层面进行比较判断。由此,以往研究以直接影响为衡量依据实际上低估了积极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本文中,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虽然没有间接影响,但在方法上也应从综合影响层面衡量其影响力。比较而言,本文的结果对科学、准确地评估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中,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该结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旅游开发给居民带来的消极影响还比较小,与其生活质量不存在尖锐的矛盾冲突。本文的实地调研也

发现,虽然一些居民对旅游开发引起的物价上涨、交通拥挤等表达了不满,但对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感知较弱,对积极影响有普遍较高的认同度。这表明,旅游开发虽然会给当地居民带来积极和消极影响,但比较而言,主要是积极旅游影响对生活质量发挥显著正向作用,消极旅游影响对居民生活质量的负向作用很有限且不显著,从而证实了旅游开发有助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观点。本结论与何学欢等(2017)^[11]的研究结论一致。

第三,证实了社区依恋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结果表明,社区依恋对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居民的社区依恋程度越大,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负向关系越强;反之相反。本文从实证研究角度支持了 Deccio 和 Baloglu(2002)^[19]的观点。将社区依恋引入研究模型,响应了 Pappas(2014)^[15]关于整合社会交换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重要变量的建议,更合理地阐释了支持旅游开发的形成机制。以往研究一般将社区依恋作为前因变量,鲜有研究考察它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影响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关系的边界条件知识。本文也发现,社区依恋对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原因可能在于,旅游开发降低居民的外显依恋后,居民从旅游开发中没有获得理想效益,外显依恋未能给予内隐依恋积极反馈,从而削弱了社区依恋对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关系的影响。

3. 管理启示

本研究得到以下三方面管理启示:

第一,旅游规划、开发、管理等行为应兼顾社区居民利益。本文发现,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和支持旅游开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的积极旅游影响有助于提高居民支持旅游开发。为此,在旅游规划、开发、管理等过程中,旅游企业的行为不能只是一种单纯的利己行为,还应该兼顾当地居民利益,变积极旅游影响为惠民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影响,这并不表示消极旅游影响不会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形成这种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旅游地处于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消极旅游影响的破坏作用还十分有限。但是,消极旅游影响一旦超出居民的心理承载力,必然会影响其旅游开发态度。基于此,旅游企业仍然需要积极防控消极旅游影响,以免因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而遭遇居民的反对。

第二,从总体影响评估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力。本文发现,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通过生活质量产生的间接影响。因此,单纯地从直接影响进行评估,容易低估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力,不利于通过比较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来判断居民的旅游开发态度。为此,旅游企业应该重点关注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从总体影响视角科学评估二者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力。

第三,努力提高社区依恋程度高的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本文发现,居民的社区依恋程度越高,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负向影响越强。这意味着,赢取高社区依恋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是促进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为此,首先,应加强对居民生产、生活和居住环境的保护,维持居民与居住社区的交互关系,维系居民的内隐依恋和地方情感;其次,把居民当作旅游开发主体,从生活条件、社区安全、休闲娱乐等方面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减小他们的消极旅游影响感知;最后,根据外显依恋的不稳定特征,旅游开发中积极为居民创造利益,坚持旅游开发与社区利益协调原则,以外力增强居民的外显依恋,促使外显依恋与内隐依恋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

4.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文也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是把主观生活质量作为整体构念引入模型。旅游研究中,主观生活

质量已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多维度构念(Dolnicar等,2012)^[48],不同维度对支持旅游开发可能具有不同影响。未来研究应将生活质量各维度引入模型,考察它们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力和相对重要性。二是整合其他理论中的重要变量时只考虑了场所认同理论中的社区依恋。有研究表明,社区参与、自我效能、居住时间等也可能是影响支持旅游开发的重要变量。未来研究可将其引入模型,以便更好地反映支持旅游开发的形成机制。

参考文献

- [1] Nunkoo, R., and Ramkissoon, H. Power, Trust, Social Exchange and Community Suppor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2): 997 - 1023.
- [2] Kim, H. L., Woo, E. J., and Uysal, M. Tourism Experi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Elderly Touris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1): 465 - 476.
- [3] Nunkoo, R., and Gursoy, D.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An Identity Perspectiv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1): 243 - 268.
- [4] 王咏, 陆林.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及应用——以黄山风景区门户社区为例[J]. *北京: 地理学报*, 2014, (10): 1557 - 1574.
- [5] Gursoy, D., and Rutherford, D. G. Hos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An Improved Structural Model[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 495 - 516.
- [6] Woo, E., Kim, H., and Uysal, M.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5, (1): 84 - 97.
- [7] 卢松, 张捷, 唐文跃等.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类型划分——以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为例[J]. *北京: 农业经济问题*, 2008, (4): 69 - 75.
- [8] Nunkoo, R., Ramkissoon, H., and Gursoy, D. Public Trust in Tourism Institution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 1538 - 1564.
- [9] 郭英之, 叶云霞, 李雷, 姜静娴, 彭兰亚. 中国旅游热点居民生活质量感知评价关联度的实证研究[J]. *北京: 旅游学刊*, 2007, (11): 58 - 65.
- [10] 何学欢, 胡东滨, 马北玲, 粟路军. 旅游地社会责任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J]. *长沙: 经济地理*, 2017, (8): 207 - 215.
- [11] Kim, K., Uysal, M., and Sirgy, M. J. How does Tourism in a Community Impac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 527 - 540.
- [12] Liang, Z. X., and Hui, T. K.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6): 56 - 67.
- [13] Nunkoo, R., and Gursoy, D.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An Identity Perspectiv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1): 243 - 268.
- [14] Ryan, C., Scotland, A., and Montgomery, D. Resident Attitudes to Tourism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Rangitikei, New Zealand and Bakewell, United Kingdom[J]. *Progress in Tourism & Hospitality Research*, 1998, (2): 115 - 130.
- [15] Pappas, N. Hosting Mega Events: Londoners' Support of the 2012 Olympic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1): 10 - 17.
- [16] Wang, S. S., and Xu, H. G. Influence of Place-based Senses of Distinctiveness, Continuity, Self-esteem and Self-efficacy on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7): 241 - 250.
- [17] 史春云, 韩宝平, 刘泽华, 张兴华. 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比较研究——以九寨沟、庐山和周庄为例[J]. *长沙: 经济地理*, 2010, (8): 1400 - 1407.
- [18] Um, S., and Crompton, J. L. Measuring Residents' Attachment Levels in a Host Community[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7, (1): 27 - 29.
- [19] Deccio, C., and Baloglu, S. Garfield County Resident Perceptions of the 2002 Winter Olympics: The Spillover Effect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2, (1): 45 - 56.
- [20] 王纯阳, 屈海林.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J]. *北京: 地理学报*, 2014, 69, (2): 278 - 288.
- [21] Wang, S., and Chen, J. S. The Influence of Place Identity on Perceived Tourism Impact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5, (2): 16 - 28.

- [22] 卢松,张捷,李东和,杨效忠,唐文跃.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比较——以西递景区与九寨沟景区为例[J]. 北京:地理学报,2008,(6):646-656.
- [23] Sinclairmaragh, G., and Gursoy, D. A Conceptual Model of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Tourism Planning & Development*, 2016, (1): 1-22.
- [24] Bagozzi, R. P. A Field Investigation of Causal Relations among Cognitions, Affect, Intentions, and Behavior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2, (4): 562-583.
- [25] Chen, C. F., and Chen, P. C.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0, (4): 525-545.
- [26] 梁增贤,黎结仪,文彤. 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生活质量感知研究——以广州为例[J]. 北京:旅游学刊,2015,(9): 72-81.
- [27] Uysal, M., Sirgy, M. J., Eunju, W., et al. Quality of Life (QOL) and Well-Being Research in Tourism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2): 244-261.
- [28] 周长城,刘红霞. 生活质量指标建构及其前沿述评[J]. 济南:山东社会科学,2011,(1):26-29.
- [29] Andereck, K. L., and Nyaupane, G. P.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ourism and Quality of Life Perceptions among Residents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1, (3): 248-260.
- [30] Jeon, M. M., Kang, M., and Desmarais E. Residents' 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 in a Cultural-Heritage Tourism Destination [J].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16, (1): 105-123.
- [31] 吴泗宗,朱家川. 网购体验质量对消费者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概念模型的构建和假设提出 [J]. 合肥:江淮论坛, 2015, (3): 48-53.
- [32] Croes, R. Assessing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2, (5): 617-631.
- [33] 汲忠娟,蒋依依,谢婷. 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研究综述 [J]. 北京:资源科学,2017,(3):396-407.
- [34] Wilson, T. D., Lindsey, S., and Schooler, T. Y. A Model of Dual Attitudes [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0, (1): 101-126.
- [35] 骆泽顺,林璧属. 旅游情境下内隐—外显地方依恋模型研究——基于心理学视角 [J]. 北京:旅游学刊,2014,(12): 45-54.
- [36] Scannell, L., and Gifford, R. Defining Place Attachment: A Tripartite Organizing Framework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1): 1-10.
- [37] Lee, T. Influence Analysis of Community Resident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2): 37-46.
- [38] Nunkoo, R., and Ramkissoon, H. Developing a Community Support Model for Tourism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 964-988.
- [39] Nunnally, J. C. *Psychometric Theory*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 [40] Ramkissoon, H., Smith, L. D. G., and Weiler, B. Relationships between Place Attachment, Place Satisfaction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in an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3, (3): 434-457.
- [41] 徐文燕,钟丽莉. 基于地方依恋视角的旅游地居民对乡村旅游支持度研究 [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 100-110.
- [42] Gaunette, S. M.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Jamaica [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7, (1): 5-12.
- [43]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et al.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5): 879-903.
- [44] 李召敏,赵曙明. 雇佣关系模式对福祉影响的差异——基于激励—贡献模型视角 [J]. 北京:经济管理,2015,(12): 56-67.
- [45] Baron, R. M., and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6, (6): 1173-1182.
- [46] 周长城. 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5): 581.
- [47] 刘昌雪. 农民对农村发展旅游业的认知与态度研究——以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为例 [J]. 哈尔滨:商业研究,2008, (9): 164-169.
- [48] Dolnicar, S., Yanamandram, V., and Cliff, K. The Contribution of Vacations to Quality of Life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1): 59-8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Quality of Life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

GUO An-xi^{1,2}, GUO Ying-zhi^{1,3}, LI Hai-jun³, JIANG Hong²

(1. Post-doctoral Station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Shanghai 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201400, China;

3. Department of Tour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How to promote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that tourism academic circle and industry circle are concerned about. It profoundly reveals that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local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to the long-term succ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y.

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 this study is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integrating the variable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from the theory of place identity. With the 458 valid responses of the questionnaires from the historic scenic town Wuzhen in Zhejiang Province, it examines how the residen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s impact on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quality of lif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s the antecedent variable of the nearer end for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on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not only has a direct effect, but also an indirectly mediating effect, while the previous studies underestimated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on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ly on the direct effect. Community attachmen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negative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That is to say, the higher the community attachment perceived by local resident is, the stronger negative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negatively correlates to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vice-versa.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to assess the func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to reveal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o enhance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it confirms that quality of life is the antecedent variable of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while previous studies rarely took quality of life as the antecedent variable for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introduced into the model, it also expands the scope of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of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Second, it strengthens that residents' positive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has both direct effect and indirect effect to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negative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s only directly affect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without indirect effect. It is significant to th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assessmen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Third, it substantiates that residents' community attachment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negative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t enriches the boundary condition knowledge affecting on relations between negative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Meanwhile, this study also has its limitation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 it does not include other dimensions of quality of life when it introduces quality of life as a whole construct into the model, and the future studies should take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model,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relative importance to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Second, it only takes the variable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the theory of place identification, when integrating the important variables in other theories. And it neglects other important variables such a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self-efficacy, which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model in the future to better reflect the mechanism of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Key Words: perception of tourism impact;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quality of life; community attachment

JEL Classification: D12, Z23

DOI: 10.19616/j.cnki.bmj.2018.02.010